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 总主编 罗以澄

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 主编 李良荣

历史

的探索

林晖
编撰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二期项目“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课题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

编委会主任 罗以澄

编委会委员 许汉生 石义彬 单 波

张金海 秦志希 强月新

王瀚东 吕尚彬

编委会特邀委员 李良荣

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

主编 李良荣

历史 的 探索

林晖
编撰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探索/林晖编撰.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1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罗以澄总主编

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李良荣主编

ISBN 978-7-307-06824-7

I. 历… II. 林… III. 新闻工作—改革—中国—文集
IV. G21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342 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0.5 字数: 57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824-7/G · 1325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繁荣昌盛，以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勃兴和传播新技术的扩散，我国社会正在急剧地向媒介化社会转型。社会的媒介化趋势持续建构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子系统，从而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结构化，并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创造及跨文化传播的交流方式。如何理解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的关联，认识媒介化社会的本质，寻求中国在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动力，如何解决媒介化社会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理应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在 2005 年年初，武汉大学的“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创设了“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并设置了“新闻传媒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系列课题，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上，开始致力于新闻传媒与媒介化社会这一重大课题的艰辛探究。现在推出的“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论丛”便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论丛分为两个书系，一是“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二是“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研究维度上，探索新闻媒介与社会改革的互动是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转型，以及新闻传媒又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要素的。这两个书

系，是武汉大学学者会同校外专家共同研究的结晶。“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李良荣教授领衔主编，该书系从新闻改革的“进程与逻辑”、“理论探索”、“实践轨迹”三个角度，对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宏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富有创见、理性和建设性的解读与观照，形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探索》、《历史的轨迹》3部著作。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系统反思新闻改革的创造性成果。“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则由我本人领衔主编。该书系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6个研究团队分工负责、联合攻关，最终推出了6部著作。其中，《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一书集中于揭示在社会与媒介双重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之间的互动互构，从而形塑中国媒介化社会的内在机制；《政治文明与新闻传媒》一书侧重于揭示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互动与互促，从而推进社会的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新闻传媒与社会文化》一书重在探究新闻传媒与社会文化进步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当下多元文化冲突与新闻传媒的文化责任；《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一书则着重分析在今天的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新闻传媒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与机制；《媒介经济与传媒产业发展》一书主要揭示新闻传媒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媒介经济新景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生机制；《传播新技术与社会发展》一书侧重于探索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与扩散对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影响和促进，以及对于媒介生态的作用与优化机制。

从总体上看，这套丛书在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一，前瞻性。无论是“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还是“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关系研究书系”，都不同程度地

涉及对于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媒介化社会发展的演进逻辑的分析，但我们更重视对于新闻改革和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当下问题的解决，更重视对其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与分析。例如，《历史的选择》等著作对于我国新闻改革已经走过的30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同时，更侧重于对新闻改革的发展趋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学术探寻。《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等著作则立足于和谐社会构建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范式，来审视中国的新闻传媒与社会转型的互动、互构机制，来探索新闻传播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如何达成和谐与契合，从而实现新闻传媒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前瞻性探索，是这套丛书的学术旨趣的重要方面。

第二，战略性。在今天的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情境下，我国的新闻传媒生态和发展态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而又剧烈的转型和变迁，新闻传媒的发展正处于市场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民本化转型的关节点上。如何在有效地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提高传媒竞争能力，把我国新闻传媒做大做强的同时，建构新闻传媒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科学发展进程，营造和谐、健康的新闻传媒发展生态，把握好信息公开、传播自由和规范化调控的辩证关系，从而促进新闻传媒的社会公正守望者、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共识的推进者、社会利益表达的枢纽站、社会冲突的减压阀等功能得以最佳发挥，是我国新闻传媒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好的宏观战略问题，这也正是这套丛书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三，创新性。中国的新闻改革与媒介化社会发展趋势，是今天全球传播学者共同瞩目的学术问题，也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华人学派提升学术话语影响力的基础领域之一。这套丛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首先推出的分析与解决“中国社

会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这一复杂性问题的系列专著。其间，对我国新闻传媒改革与转型的概貌富有学理深度的呈现，对我国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的深度揭示，对我国新闻传媒与政治文明、文化转型、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究，对多元文化背景下新闻传媒实施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与规律的观照，对传播新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影响的分析等方面所形成的创新观点，希望能够给予人们以启迪。

最后，作为这套丛书的总主编，要向9部著作的作者及撰写参与者，尤其是以李良荣教授为首的校外作者与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套丛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校内外研究团队精诚合作的努力，没有全体作者和参与者的创造性劳动，就不会有这套丛书。我还要向武汉大学出版社及其学术分社的领导、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他们的鼎力支持，这套丛书才得以如此迅速地顺利问世。当然，我也要向各位读者表示感谢，你们的接触和阅读，是丛书价值实现的最终环节，你们的意见更是促进这套丛书臻于完善、思想臻于深邃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罗心世

2008年12月于珞珈山

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序

罗以澄

从 1978 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四重社会转型浓缩、叠加在同一时空的新时代。与社会转型同步启动的新闻改革，也由此走过了整整 30 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新闻改革的推进，我国新闻传媒业至少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型：

首先是市场化转型。在市场化轨道上，我国新闻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闻传媒业的“身份”开始改变。30 年前，我国新闻传媒业都是单一的“事业”单位，都是单一的党的宣传部门、宣传机关。30 年间，我国传媒业先后经过了三次“身份”改变：第一次是 1978 年由《人民日报》等 7 家首都新闻单位提出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得到了批准，并在全国传媒业中推广。这次“身份”改变的实质，就是允许新闻传媒组织作为事业单位有一块搞企业化管理。第二次是 1993 年 6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准其实行商业化运作；2001 年 8 月，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更是明确将传媒业中的“发行集团”和“电影集团”等一起从“事业性质”中剥离出来，定位为“企业性质”。这第二次“身份”改变，就是允许传媒业从整体上实行“事业性质”和“企业性质”两种身份共存。第三次是 2003 年，中央先后出台

了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文件，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进一步将党报、党刊这样一些核心媒体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分离开来，经营部分另外组成企业集团。这第三次“身份”改变就是允许党报、党刊也实行“事业性质”和“企业性质”两种身份共存。这样，我们现在的传媒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媒两制”，既是事业单位，又是企业单位。市场化转型给新闻传媒业带来的另一个大变化是，新闻传播的理念、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上的改变。这突出表现在，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已经由原来体制下的受众，演化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由此，新闻产品的“商品性”日益显现，“争夺眼球”成了众多传媒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市场化转型给新闻传媒业带来的另一个大变化是，其产业的经营方式也改变了，由过去国家“包养”，变成自己到市场上谋生路，去打拼。这样，各种各样的市场化经营手段和运作方式在传媒业中得以流行。打价格战，挖人才，组建“集约型”的传媒集团，实施跨媒体、跨区域经营，进入资本市场搞“上市”，“走出去”与国际市场竞争等等。总之，现今传媒业的市场主体角色愈来愈强化。

其次是民本化转型。所谓民本化转型，指的是媒介角色正在从过去纯粹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向国民信息传播工具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尽管现在我们的传媒依然接受执政党（政府）的新闻宣传思想指导，但同时也强调“以受众为本位”的新闻报道理念。第二，媒介的总体结构已不是党媒“一统天下”了，而是由党媒、市场化媒介、公共媒介等不同类型的媒介共同构成，媒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第三，新闻传播的运作，开始注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的满足。尤其是近几年来新闻传媒对诸如广州孙志刚事件、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江苏太湖“蓝藻”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虎照”事件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河北“三鹿”奶粉问题、哈尔滨警察伤害大学生案件等新闻事件所作的透明化报道，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张扬的结果，

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新闻传媒宏观政策的价值重心正在逐步地向满足民众的信息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见表达权实现的方向转移。第四,新闻报道的“平民化”倾向彰显,传媒的“亲民”形象日趋浓烈。在今天的传媒上,我们可以发现:“小众”化、“窄播”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民生”新闻成了众多传媒的“主打”产品,把新闻做“软”,凸显新闻的人情味和情节性、趣味性成了不少传媒的“看家”法宝,用个性、特色“约会”受众,更是成了许多传媒的一大流行特色。

再次是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的创新、传播与扩散,直接而剧烈地引发了新闻信息传播与媒介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仅仅从新闻传播这一个方面来看,数字化转型将呈现出这样七大趋势。^①第一,传播活动网络化。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不仅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所有环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为新闻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基础平台。当今人类所有传播活动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既从宏观上改变了传统的传媒格局和传播生态,又从微观上改变着新闻信息传播机构的运作方式。第二,传播渠道复合化。不仅各类信息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而且不同形态的传播渠道相互融合。尤其是伴随着电视、通信、网络的“三网合一”工程的推进,媒介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使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复合化、整合化。第三,传播主体多元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体及媒介集团之外,目前值得关注的传播主体还包括各类专业信息机构、民营传媒产品生产企业、电信运营商、广大的个体网民。截至 2008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2.53 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 84.7%,宽带网民数已达到 2.14 亿人;中国网民中的 28.9% 在过去半年曾经使用手机上过网,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7305 万人;中国网站数量为 191.9 万个,年增长率为

① 唐润华:《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的七大趋势》,范以锦、董天策主编《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 页。

46.3%。其中CN下的网站数为137万,占总网站数71.4%。^①网民规模的剧增和新媒体的发达,已经使网络舆论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第四,受众和市场的碎片化。在这样一个“分众传播”的时代,无限增长的媒介资源正肆意地争夺着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受众裂变为基于不同兴趣与需求的“碎片”。与之相适应,传媒市场也从过去的整体市场细分成各层次的多元市场。第五,产品形态多媒体化。今天的新闻信息的采集、发布和互动,可以通过文字、图表、视频、音频动画等介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适时互动的多媒体表达。网络媒体、IPTV、手机媒体、楼宇媒体、电子杂志、电子阅读器等新媒体都可以展示多媒体形态的新闻信息。第六,信息流通的全球化。地球已经被各种传播网络层层包裹,新闻信息跨国界传播、受众对国际新闻信息需求量增大、境外新闻传播机构加紧向中国市场渗透等,成为信息流通全球化的重要表征。第七,传播机构形态两极化。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新闻信息传播机构的功能、类型与形态也在发生着结构上的变化,部分机构成为面向大众市场的综合性全媒体集团,另一部分机构则成为面向分众市场的小型新闻信息传播机构。

新闻传媒业的市场化、民本化、数字化三个方面的转型,昭示着我国新闻改革30年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在实施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新闻传媒业存在着观念、制度、技术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着改革的深入开展,影响着新闻传媒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迫切需要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集中力量,对新闻改革进行系统总结和理性反思,对其成就进行总结、问题进行揭示、经验进行归纳、教训进行反思,并提出持续推进和深化新闻改革的对策思路。因此,早在2006年,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985创新研究基地就设立了“中国新闻改革30年研究”的课题,并委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良荣教授领衔承担课题研究任务,以期全面、系统分析新闻改革的成败得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2008-09-11>。

失和经验教训。

李良荣教授是我国当代具有重要理论建树的新闻传播学者之一，也是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亲历者、探索者、推动者之一。他不仅为我国各个阶段的新闻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理论资源支持，而且长期追踪和观照新闻改革的进程、路向和前沿动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接受课题研究委托以后，组织了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联合攻关，呕心沥血，历时两年，完成了研究任务，提交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既是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985 创新研究基地“中国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的课题最终成果，更是李教授及其团队对于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富有创见和理性、建设性的解读。

作为《新闻改革 30 年研究书系》的第一个读者，我有幸先睹为快，形成了一些阅读体会和想法，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享。

整个书系从“进程与逻辑”、“理论探索”、“实践轨迹”三个维度对新闻改革和新闻传媒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整体观照，形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探索》、《历史的轨迹》三本著作。其间，承载了研究者的创新思想而显现出的特色与价值主要是：

第一，《历史的选择》重在对新闻改革的进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了新闻改革的过程、特点、问题与发展趋势，呈现了我国新闻传媒业改革与转型的概貌。作者把新闻改革 30 年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概括为“在新闻规律的旗帜下（1978—1982 年）”、“新闻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1982—1989 年）”、“新闻媒体性质的重新定位（1990—1999 年）”、“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2000—2008 年）”，并就此进行深度分析，这是极有见地的。著述清楚而令人信服地表达了在渐进式改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路径中，我国新闻传媒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了新闻传媒在改革中转型和发展的进程。作者从前 17 年与后 13 年两个阶段对于新闻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概括，认为，前 17 年的新闻改革，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

闻媒介的改革”，后13年的新闻改革的总体特征，则是“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央掌握改革主导权”、“从观念更新走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动动力”、“从边缘突破走向中心突破——新闻报道成为新闻改革的主攻目标”、“从增量改革走向盘活存量——中国党报打造主流媒体”。这是我国新闻学者首次对新闻改革特征进行的学理梳理和概括。而在今天，我国的新闻改革走到了一个问题爆发期和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作者认为，“结构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范”正是目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媒介生态环境的种种因子的影响，但深层原因在于传媒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双重属性和机关、事业、企业三种身份的冲突。因此，在传媒改革的攻坚阶段，党报改造、时政新闻突破以及制度创新是三大难点，也是我国新闻改革持续推进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注意到新闻改革的动向和新趋势。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传播技术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扩张。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革命，也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传播方式，消解的同时重构着传媒结构。与此同时，在对传媒市场化转型进行深度反思的过程中，一股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传媒的公共性、重视媒介社会责任传统的新思潮悄然兴起，并开始在传媒业形成冲击波。新的数字技术与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的两大力量将激发新世纪中国传媒业一场新的改革。尤其是在反思市场化转型进程中的商业新闻的冲击，促使新闻改革的行动者再一次回归对于新闻传播规律的体认，对于传媒的公共性本质的认同，倡导新闻专业理念，凸显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重视新闻报道的“公开、公平、公正、速度、广度、深度”，将成为新闻改革的基本走向。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在与社会转型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新闻媒介的民本化转型、公共性建构这一重要趋势，以此为基点来把握新闻改革的未来路向，来设计解决关键难题的路径，表现出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从而使分析、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此外，作者还对构成新闻改革有机板块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改革与发展，包括中国新闻文体变迁、新闻体制

和管理模式、传媒经营、新闻理论的回归与跃进、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形态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了多视点而又比较细致的勾描，不仅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支持，而且呈现了新闻改革的总体概貌。

第二，《历史的探索》揭示了新闻传播学者引领、推动新闻改革的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本书从汗牛充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论文中，以年度为线索，选择了 30 余篇能够代表 30 年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探索成就的论文，试图呈现学者“历史的探索”的努力成果。尽管时至今日，中国理论新闻学仍然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流派，也很难像转轨经济学、发展社会学那样高度概括其 30 年的学术轨迹，但学者们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仍然在中国媒介的现代历程中留下了珍贵的总结和纪录。也许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导致这一选编还有一定的缺陷，但选编者的主观意图大体上是实现了的。虽然我国的新闻理论探索以对实践的观照和引领作为自身的使命，但理论并不是对实践亦步亦趋，自身有它的生成和发展逻辑。作者通过对相关论文的选编和排序、评价，揭示出了这一新闻理论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本书的选编者以 10 年为界，把我国新闻学理论的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的 10 年。这一阶段，由引进信息概念引发的对于媒介功能的解放、对新闻本性的重新认定、对于新闻规律的归纳和尊重是这 10 年的最大贡献。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其间，最活跃的是伴随媒介经济的成长在媒介经营管理、广告、资本运营、传媒集团等在经济逻辑上展开的研究。媒介经济、媒介产业化成为业界和学界都炙手可热的话题。第三阶段：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 10 年。这一阶段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应对国际挑战、立足于寻求中国媒介做大做强、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但最后逐渐汇聚到一点：打造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中国媒体，促进社会进步，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理论探索历程，大体上呈现出以“新闻”探讨开始，以对“专业主义”的反思收尾的思考轨迹；“信息”、“媒介产业”、“专业主义”等构成了 30 年间理论界探讨的关键词，也标志着新闻理论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三次思想跃进。

第三,《历史的轨迹》是从新闻文本的视角、新闻实践结晶的层面,勾画我国新闻改革的全过程。全书选编了有重大影响和重大成就的 75 篇各类新闻文本,汇集了记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典范新闻文本,从而展示出新闻改革的实绩。无论是标志着新时期我国思想解放运动起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了“两个凡是”禁锢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首先揭开“大寨”问题盖子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惯例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揭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生活变化的《历史性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记载中国女排大获全胜的《金杯之光》,还是拉开城市改革序幕的《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表达国民对改革开放由衷拥戴的《“小平您好”》、再现深圳这个昔日小渔村成为特区后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圳河畔的新消息》、开创新时期深度报道先河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而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到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真实记录邓小平南方视察之旅的《东方风来满眼春》,抑或是客观报道中英香港交接仪式这一历史瞬间的《别了,不列颠尼亚》、及时通报中国完全有能力拒绝金融风暴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揭开重庆綦江彩虹桥垮桥真相的《綦江垮桥的背后》、最早深度报道矿难事故的《南丹“7·17”事故初探》、展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艰难历程的《风雨入世路——中国与 WTO》,还有导致一部法规废除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在第一时间记录北京奥运会的精彩开幕过程的《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等等,新闻改革的每一次创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里触摸、体验。来自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新闻媒介的“影响巨大的重要新闻”、“对历史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作品”、“对新闻业务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推动新闻文体发生大变化的作品”被汇聚在一起,集中展示出新闻改革实践的“历史的轨迹”。

尽管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风雨历程,但新闻改革的进程方兴未

艾，正在持续推进。希望这套书系，不仅能够“给新闻改革的实践者们一个历史的回顾，给当下新闻改革的探索者们一个现实的观照”，更能够给予“未来新闻改革者们薪传火续”的启迪，为未来的新闻改革实践者们提供适应新机遇、解决新问题的参照，为未来的新闻传播学者提供深化研究的借鉴和基础。

是为序。

编辑说明

本书旨在总结我国新闻改革三十年的成果，记录学者们在新闻改革探索过程中的思考，汇集了三十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反映新闻学各研究方向上的探索，以便读者完整地了解三十年来学界探讨的轨迹。

由于各篇文章在不同年代发表于不同的报纸、期刊，其间出版规范亦有细微调整，因此各篇论文的行文、风格、用字、著录格式等所遵循的出版规范均不统一。例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常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本世纪”等词语单独出现，前面无限定词语，不同年代文章中有“惟一”、“唯一”的不同用法，各篇文章中脚注、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均不一致，等等。为了保留历史风貌，保留原汁原味，此次收录时对这些问题未作改动，只对个别文字及标点作了修改，每篇文章风格、版式等相对独立统一。各篇文章末均附有初版时间和登载的期刊名称等说明，不会引起歧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